

太平天国的运动性质与历史评价问题

刘 晨

【摘 要】太平天国运动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数百万太平军民投身起义浪潮的动机深具正义性。但作为旧式农民运动,他们创立的“天国”实际仍然主要沿用封建王朝旧制,洪秀全等天国领袖找不到走出农民战争失败宿命的新路,最终在清政府与侵略者的夹击下,归于失败。太平天国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历程是曲折而惨痛的。这昭示了近代中国抵御外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太平天国运动性质以“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为表述较为合乎实际。同时须对全盘否定和黑化、丑化太平天国及其领导人洪秀全等的论调作出必要回应。无论如何,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属于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范畴,它呼应了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剥削、反抗外来侵略的时代诉求,其革命性与进步性不容否定。

【关键词】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性质;农民战争

【作者简介】刘晨(1986-),男,山东滨州市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历史学博士(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23.4.61~69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清代(下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群体性事件与官方治理研究”(20CZS038)、北京大学本科重点课程建设项目“《中国近代政治与外交》课程建设”(JG2023030)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曾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热门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逐渐成为大陆学界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的讨论集中表现为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革命还是兼具资产阶级革命两种观点的分歧。范文澜、胡绳、罗尔纲充分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革命性。^①大陆学界这场争论最终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如太平天国运动是“单纯农民战争”的性质、《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性和空想性并存、后期太平天国承认旧有土地关系、乡官政权成分复杂等,并在1961年结集出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②“反帝反封建”随之成为较长时期内学界关于太平天国主要历史面相和历史作用的共识。^③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太平天国史研究陷入低谷,

同时出现了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持高度赞扬与彻底否定的两派言论。学界由是掀起一场关于太平天国历史评价的论战,这场论战波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如义和团、辛亥革命、秘密结社等,涉及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对以太平天国史为主体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省思等重大问题。否定派力主邪教说、暴君说、农民战争破坏论,与此相对的是,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持基本肯定的言论。新世纪以来,不少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也受史学思潮多元化影响,有意淡化革命史观和阶级分析论,过去各类学术观点对立渐趋融合,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已基本避谈太平天国性质问题。那么新时代我们应如何理解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内涵呢?应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呢?其

实,学术上的异见乃至争论应为学界常态。我们应在充分研读史料、进行史实考辨的基础上,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学术怪圈,理性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

一、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

洪秀全等人沿袭了以往农民起义借民间宗教起事的传统。有所不同的是,洪秀全不是单纯地接受和融合中国既有的各种宗教,而是对西方的基督教进行加工创造,糅合儒家孔学、民间宗教和传统民俗风习等因素,颠覆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宗教仪式和独立的宗教经典,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新型思想和宗教体系。此外,拜上帝的宗教思想不单纯是追求宗教上的灵魂永恒,而是带有鲜明的形而下色彩,旨在服务太平天国的政治斗争,是太平军征战天下的精神动力和太平天国官方改造世俗社会的思想武器,这较之以往农民起义破而不立的旧面貌有了较大发展和创新。和清代的秘密结社相比,太平天国推行独一真神信仰的宗教运动,以拜上帝思想汇聚力量、整肃军纪、令行禁止,有它成功和积极的一面。太平天国能够迅速地将忍耐、谦卑、散漫、懦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组建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勇猛善战的反清起义大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持久扎实的拜上帝思想的宣传教育。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不仅要颠覆剥削压迫沉重的旧统治秩序,而且还有改造中国社会的具体构想和方案。洪秀全定国号“太平天国”,“太平”一词出自洪秀全1845年所作的《原道醒世训》中“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一句,憧憬上古三代时期“公平正直”“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④“天国”一词则源于基督教的《圣经·新约》。洪秀全将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意图营建人间天国——小天堂。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颁布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社会生活领域设计了均匀饱暖的理想蓝图,这正是几千年来社会底层农民梦寐以求的生活。洪秀全把农民朴素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实践层面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为适应战时体制设立的圣库制度,理论上也是源于“天下一家”的太平观,除了杂糅儒家大同社会的理念和早期基督教财产公有观念,洪秀全还吸收了某些农民起义的组织特征,如三国时期张鲁“五斗米道”的“义舍”;白莲教“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的村社;^⑤天地会的“米饭主”。这较之以往农民起义的理想和实践更加具体、系统。虽然这些思想和制度因其空想性、落后性而难以顺利践行,但它描绘的愿景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土地和均匀饱暖生活的强烈渴求,具有相当的正义性和一定的进步性。

太平天国还在统治区强制改造社会风习。洪秀全设“生妖”“死妖”区分正邪,划分敌我阵营,希望通过移风易俗,改变世道人心,隔绝民众与传统文化、旧时风习的联系,尽快在民间社会确立独尊上帝的一元意识形态。如为确立上帝信仰,推行毁灭偶像运动,严禁孔子崇拜、祖先崇拜;为宣扬王朝正统、奉天承运,颁行天历,留发易服;基于扭转社会颓败之风,禁鸦片、娼妓等。特别是为变革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而掀起的反孔非儒运动,虽然因政策过激造成与知识分子的文化隔阂,却动摇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思想基石。建立起如此系统全面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统治方略,也为历代农民战争所不及。

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蕴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因素。从根源上说是清代中叶以来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是清政府吏治腐败、官逼民反的结果。同时,洪秀全有着比较强烈的华夷之辨、兴汉反满的汉民族意识,这既是对有清一代满族亲贵重满抑汉的民族压迫之仇视,更是源自对腐朽黑暗的现实社会之痛恨。洪秀全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还与同时代如火如荼之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产生共鸣。他虽继承了天地会的“反清”思想,但摒弃了“复明”的主张,立志开创新朝,开辟太平一统、天下一家的“新天新地新世界”。^⑥他的抗争思想还超越了地域族群间的社会冲突,呼吁“客家本地总相同”^⑦,升级为满汉之间的种族、民族斗争。洪秀全始终把斩邪留正、推翻清朝作为实现革故鼎新的基本前提,

坚持铲除暴政、开创新朝的政治斗争。十数年反清斗争实践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机器,暴露出其中央政权的虚弱无力。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八旗绿营几尽毁灭,地方力量发展起来,内轻外重(或内外皆轻)之势,不可逆转,以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是在各省独立的形势下,被迫下台。其由来之迹,甚为显明。对太平天国历史地位的评价还要充分考量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官逼民反,造反有理,是一个基本的历史判断,但绝不是“压迫有理,剥削有理,侵略有理”。历史证明,清政府已经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对象,只有推翻它,才能清除近代化的政治障碍,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洪秀全、杨秀清等人扮演了清王朝掘墓人的角色。

因此,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历史贡献在于它揭开了清王朝王纲解纽的不可逆历程,这之后中国社会积聚的改良与革命因素,使清王朝未及50年即陷入分崩离析。1866年4月,曾国藩在给丁日昌的信中慨叹:“方今群盗纵横,竭天下谋臣武夫以与无根之寇争胜负,而迄未有定,及其既定,则又力尽筋疲,悉成强弩之末。政恐拊吾背以起者,复持短长以寻干戈,后患方长,杞忧何极!”^⑧1867年7月,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谈及太平天国战争对清王朝前途命运的影响,赵烈文预言:“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⑨曾、赵均预感战后将有分裂政争局面,而赵的预言一语成谶,45年后,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王朝寿终正寝。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是造反者失败了的事业,但它的反抗精神和伟大事业激励了后来革命者们的斗志,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经验,传播了革命种子。^⑩这就不能不提到孙中山对太平天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革命党人的领袖孙中山与洪秀全同是广东客家人。孙中山自幼喜欢听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故事。孙中山常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还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同盟会成立前,他鼓励和支持留日学生刘成禺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书成后,亲作序言,充

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功绩和洪秀全的革命精神,以此鼓舞革命党人投身反清洪流。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正式宣称同盟会志士上继先人(按,明及太平天国)遗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清末十年,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宣传反满革命,蔚然成风。辛亥革命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开始有了合法的正面地位。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奉洪秀全为矢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先驱”,显然主要是从反满角度发论的。

后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酝酿和实践,不只是继承了太平天国的思想遗产,而且是在批判中有了更大发展。孙中山继承了洪秀全的反清思想,主张武装推翻清廷,但摒弃了洪秀全传统和狭隘的华夷意识,他曾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⑪这就超越了种族界限,带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内涵,而后孙中山进一步提出“五族共和”说。但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孙中山和洪秀全虽然都曾对列强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但洪秀全特别重视疆土归属,最后转向坚决抗击外敌,而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不懂外交,不知怀柔远人。直到国共合作,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才有了鲜明的反帝色彩。

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来自西方,也吸取了太平天国实行专制、崇奉皇权,以致发生惨烈内讧的历史教训。他在分析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时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此曾国藩诸人所以得奏满清中兴之绩也”^⑫，“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⑬。孙中山寻求以政治革命建立民国,号召:“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⑭对于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之道,洪

秀全借用的是基督教思想,孙中山虽是基督徒,但他主要学习和借鉴的是西方民主政治学说。在政治理念上,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显然超越了洪秀全的皇权观念。

孙中山和洪秀全都重视解决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思想就是继承了洪秀全提出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⑧而与洪秀全将土地收归国有的激进手段不同,孙中山借用西方“地价增殖归公”学说,主张用赎买的手段,以官价收购地主多占的土地,再由国家出售给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洪秀全畅想“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孙中山则主张保护私有财产,以兴办实业和节制资本集中的方式实现贫富均等。孙中山领导的这场新式运动,为中国未来社会所作的构想,超越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理想型社会改造方案。但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忽视了发动和倚靠农民的重要性。农民为革命提供了最基础的人力资源和体力支持,应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洪秀全在利用拜上帝思想动员和组织农民上则更进一步。在追溯三民主义思想源头时,孙中山继承并发扬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反抗思想。可见太平天国在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演进上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近代史上民众反侵略的第一次集中爆发

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深深留在民族记忆里并且值得百年传颂的事件,但终究属于区域性的保卫家园斗争,其战果、规模均有限,对战争进程亦无重要影响。

到太平天国兴起时,西方列强已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并利用中国内战机会,在华搞外交投机,伺机攫取更多权益。太平军主要活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是列强侵略的重要区域。太平天国与历次农民战争相比,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明

显变异。如何办理外交是太平天国面临的一个不可规避的新课题。

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地处鸦片战争的前沿,他又耳闻目睹了声势浩大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这给青年洪秀全留下了一些感性认识。后来他从扭转颓废世风和挽救世道人心的立意出发,反对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声讨妥协媚外的清朝当局,萌生了救国难以解民于倒悬的意识。这类朦胧朴素的爱国意识始终和反清思想结合在一起,还称不上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和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主义。

洪秀全早期的宗教作品涉及了一些处理国家关系的内容,反映了洪秀全坚持国家独立,主张各国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外事思想,与清朝锁国闭关相比,具有进步性。^⑨但洪秀全并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他在分析“万国一家”的原则时说:“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殒车烦马,何分此邦彼邦。”^⑩可见他所说的“国”还是中国古代分邦裂土意义上的诸侯国家。洪秀全也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平等意识,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承认外国人是同拜上帝的“洋兄弟”,但内心依然沿袭了浓厚的天朝上国观念,秉承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按照传统中国家庭的宗法观念,视西方国家为“番邦”,称西方人为“番弟”“夷弟”。在他看来,即使同家兄弟之间也应有嫡庶亲疏的区分和等次。这就表现为洪秀全外事观念中“兄弟之情”和“夷夏之辨”的潜在冲突。受环境和阅历所限,洪秀全对西方的观念形态处于盲目无知的状态,仅仅通过曲折零碎的基督教知识,显然无法洞悉世界发展大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列强看不准中国战局的胜负,相继宣布“中立”,又试图通过外交接触,了解太平天国的对外态度,摸清其底细。自1853年4月开始,至1854年6月,英、法、美外交使团相继访问南京,揭开了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接触交往的第一轮序幕。太平天国之前毫无办理外交的经验,面对这些不速之客,只能依据拜上帝“天下一家”的观念和传统中国羁縻之策处理外交事务。在具体实践中,

太平天国外事思想的消极性愈加彰显,并且影响战局走向。

首先,在外交礼仪和国际观念上引发了中西冲突。西方使团乘坐军舰而来,炫耀武力,侵犯中国内河航运主权,太平天国不以为意,却纠缠于外交礼仪,要求洋人行下跪礼,这势必引起西方使节的反感。英国公使文翰(S.G. Bonham)担心在礼节上引发冲突,打消了拜会洪秀全的念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因公文格式激怒了北王,被勒令出境。美国公使麦莲(R. M. McLane)因使用“照会”被拒绝同东王会晤。第二个来访的英国使团麦华陀(W. H. Medhurst)一行也就外交文书的格式同东王杨秀清展开书面辩论,最后悻然而返。尽管太平天国后期妄自尊大的情况有所改观,洪秀全也认同洪仁玕的新外交思维,但洪秀全的国际观念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1860年10月,洪秀全接见了罗孝全(I. J. Roberts)牧师,罗拒绝向天王下跪,但迫于太平天国坚持,只得穿上朝服在洪秀全面前向天父下跪朝拜。在1861年3月颁发的《太平天日今日是诏》《天下万方齐认作爷男诏》《天王敬哥如爷理本当诏》等诏旨中,受诏人包括“西洋同家众弟妹、众使徒”在内的“中西一体众臣庶选民”,洪秀全俨然仍以万国真主自居。^⑩

其次,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同教一家的观念使太平天国长期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太平天国与同时期清政府的外交政策有一些共性:两者都有天朝上国的浓厚情结,不愿主动同外国交往,在被迫交往时,又不愿平等相待;两者将彼此视作死敌,但都试图与列强搞好关系,以减少摩擦和纠纷,并对列强作出不同程度让步;两者都对列强抱有戒心,当列强发动侵略时,最初都是坚决反击,太平天国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友善,在外交政策上许诺自由贸易和传教,开放性略强;两者都曾表达联合列强的一定想法,太平天国的表态比清政府要早。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形势趋于恶化。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的对清军事行

动,客观上减轻了太平军的压力。洪秀全在困难形势下主动表达了争取列强消灭清廷外援的想法。在前期,太平天国领导人已表达了这层意思。1853年4月30日,东王杨秀清致信英国公使文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⑪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是年11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 B. Elgin)率舰队自上海驶往汉口,欲据条约考察沿线商务。英舰在南京江面遭太平军炮击后进行报复,将浦口炮台夷为平地。洪秀全知悉后,亲写御诏,派人溯江追送到额尔金舰上。洪秀全主动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前所未有的,下令南京至安庆沿江太平军驻地以礼相待,信使朱雄邦还向额尔金传达口信,称其为“上国钦差大臣”,一再道歉,“对业已发生的事件表示后悔,并保证不会再受到骚扰”。^⑫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在诏旨中表达了与列强联手对付清政府的意愿:“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⑬额尔金这才在返航时派随员威妥玛(T. F. Wade)等上岸与太平天国短暂会晤。太平天国方面表示“11月20日的炮击是一些无知之人犯下的错误,今后断不会再次发生”。^⑭列强既与清政府签约,本就没有与太平天国进一步接触的意向,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定。

基于宗教教义和汉民族意识,太平天国视清朝为窃国死敌,并不认为洋人打击清朝和侵略中国是一回事,所以对“洋兄弟”发动的侵华战争表示赞许,还一再表示希望联手推翻清廷。1860年春,12名太平军将领联名照会英法联军统领,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拍手称快,并请求联合进兵:“久闻麾下已破仙城,革除吏弊,施行仁政,大得民心,弟等曷胜欣幸,意欲刻即统兵前来,大齐斟酌,共展鸿图。”^⑮1861年,驻南京活动的英国副领事富礼赐(R. J. Forrest)在干王府看到“墙上贴着一份有关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的旧报道,末尾还题有太平天国常见的‘杀尽妖魔’的口号”。^⑯这些均表明太平天国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又被同教一家的宗教观念和列强长期鼓

吹欺诈的“中立”政策模糊了敌我界限,以致在外交中犯了不少错误。

比如太平天国允许列强兵舰、商船在长江内河自由航行。《北京条约》签订后,为尽快落实长江通航通商,英国人转而主动与太平天国接触。1861年2月20日,英国水师提督何伯(J. Hope)、“深淘”号舰长雅龄(Aplin)、参赞巴夏礼(H. S. Parkes)率舰队驶至南京。经过一个多月谈判,太平天国基本接受了英国提出的有关长江通航通商八项要求,许诺“在一年内太平军不干涉长江商业,同时也不以任何方式进攻上海”,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以内的区域。^⑤洪秀全非常高兴,专门颁诏,宣称“中西永遵和约章,太平一统疆土阔”。^⑥太平天国也同样应允其他列强长江通航通商航权。后来列强就是利用通航特权,帮助清朝方面运送武器和军队。1862年4月,李鸿章的淮军由英国船舰运抵上海。为保护洋人,太平军还作了大量军事让步,进攻上海、武汉的战役功败垂成均与此有关。太平天国还给予列强治外法权,“至贵国人民犯法,自当送交贵国惩治,本国人民犯法,亦由本国惩治,敬如所约”。^⑦

洪秀全认为作出些许让步就可以和洋兄弟维持长久和好的关系,但这仅是一厢情愿。列强关注的是如何落实不平等条约的各项条款,保护在华商业利益,实现中国内地开放和鸦片贸易合法化。因此,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并不取决于后者的态度和举动,而是视在华利益而定。太平天国念念不忘的是推翻清廷,攻取上海是东征战略的最重要环节,洪秀全、李秀成等认为势在必行且志在必得。双方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出现了第一次上海战役时,英法联军在北方与清军交战,却在上海与清军联手对付太平军的怪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凭借《北京条约》扩大了在华权益,不予太平天国外交承认和不视太平天国为外交对手的态度愈加明确,且列强始终称之为“叛军”。列强转而和太平天国交涉,是因为太平天国控制着长江沿线大片地区,为了力阻战火燃及通商口岸,避免各国利益受损,利用协定的缓冲期作更多准备,并不意味其外交政策有所变化。而

洪秀全则认为可以用一年缓冲换取列强的好感和认可,为来年攻取上海作准备。双方的认知格格不入。

随着太平军年内不进入上海周边地区的协议期限届满,1861年12月27日,何伯及舰长宾汉(H. M. Bingham)一行照会太平天国四项条款,要求“恪遵前议,于上海、吴淞两处百里之内,不得前往”,增加汉口、九江、镇江焦山等处太平军不得攻扰,意将条款永久固定。1862年1月1日,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代表太平天国正式复照:“普天之下,莫非上帝所造,我天朝兵将重任在肩,为上帝而投身义战,光复中华全国,凡属我国版图,寸土必争,势难有所例外。只因考虑到贵我两国本属同源,我等才恪遵协议行事迄今”,“正值我天国筹划派遣大军攻取汉口、九江、镇江焦山之际,贵邦竟试图占领此等若干重要据点,完全钳制我军行动,假托友好,暗助清妖,岂非咄咄怪事”。^⑧太平天国的照会大义凛然,不卑不亢,处置得当。随后,其对外策略发生了较大转变。1862年1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在此前后,江浙地方官员绅民呈请朝廷“借师助剿”,1862年2月8日,清廷颁发“借师助剿”上谕。^⑨英、法直接出兵上海外围和宁波,并许现役军官戈登(G. G. Gordon)和退役军官日意格(P. M. Giquel)以个人名义受雇于清政府,组建常胜军、常捷军等洋枪队,与清军联手剿杀内地太平军。列强正式撕下虚伪的中立面目,开始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太平天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宣告破裂。

自此,太平天国面临着反清和反侵略的双重重任,并在苏南和浙江战场抗击来犯的侵略军和中外混合军,予敌以重创。但列强助剿改变了战争力量对比,极大地影响了战局走势。在英、法军队协助下,湘淮军在东西南三线形成夹击之势,太平军全线告急,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列强的武装干涉,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外因。

在太平天国与清王朝的这场殊死搏杀中,双方的对外政策最终出现了根本性区别:太平天国后期转向抗击外来侵略;清政府妥协投降,丧权辱国。太平天国领导人始终对洋人存有戒心。李秀成断然拒

绝了原常胜军领队白齐文(H. A. Burgevine)做一支军队统帅以便单独行动的要求,只允许他带领自己原有的军队。^③洪秀全拒绝了洋人联手灭清、事后平分疆土的提议,据李秀成回忆,“鬼子到过南京,与天王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地土,其愿助之。天王云不肯:‘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④洪秀全还号召太平军“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务须恪遵朕之诏命,勿惧妖魔奸谋,奋勇作战,以至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⑤清廷在列强挑起战争之初,不愿屈服,曾展开抵抗。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廷权衡利弊,审察时局,认为内乱乃心腹大患,外人志在通商,属肢體之患,故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借师助剿。^⑥

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具有国际观念,承认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洪秀全的主流外交思想是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还不能将之提升至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层次。近代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民族主义萌生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华民族历史上意义非凡的抗日战争则是中国人爱国的强烈体现。无视时代局限便是苛求历史。在近代中国自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变易过程中,太平天国又是不可缺少和有所嬗进的链环。后期太平天国领导人产生了平等看待中国以外地区文明的思想火花,意识到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所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洪仁玕的平等外交新思维付诸实践,在此基础上演绎出全体军民愤然投身的爱国壮剧,在性质上颇有些卫国战争的意思。较之前的三元里、反入城等“夷夏”之争,以及后来的反洋教、义和团等排外主义运动,太平天国显然在历史局限中距近代民族主义更近些。

当然,太平天国反侵略思想的形成历程是滞重、曲折而惨痛的,成千上万的太平军付出了血的代价。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包括接受了近代外交思维的洪仁玕、处理洋务颇多的李秀成,他们都是通过一连串惨痛的教训,才逐渐洞察到列强虚诈险恶的用心。洪仁玕后来一改对西方人的友好和对西方

世界的钦慕,将“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亦非力所强为谋之耳”^⑦,作为太平天国败亡的原因之一。李秀成被俘后在自述中强调“欲与洋鬼争衡”“要防鬼反为先”。^⑧二人异口同声,可谓切肤之痛,字字血泪。这昭示了近代中国抵御外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主题。随后19世纪70-90年代的边疆危机,验证了洪、李二人的预言。

三、“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

过去讲太平天国“反封建”,主要是基于太平天国空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政府统治,清王朝是封建王朝,而太平天国是农民政权。实际上,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权性质,学界向有争议,主要形成了封建政权说、农民革命政权说、过渡政权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封建化或两重性政权)三种不同的观点,且迄无定论。而按照唯物史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两大阶级,尽管有对立有区别,无论是农民政权,还是地主政权,其实都属于封建政权。

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革命性质”问题的实质是太平天国代表了什么人的利益,反映了哪些利益诉求。而太平天国政权是否代表农民利益,是否维护农民利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太平天国政权代表了以太平军军事贵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统治者的利益,这个核心利益从未被削弱。太平天国自始至终不存在核心利益的转变和过渡问题,也就无需进行“以新封建代旧封建”的政权性质界定^⑨,洪秀全倡行礼教,旨在建立一个特权等级社会,本身不存在新旧社会的转型交替。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爆发绝非由一个阶级主导并倡行,而是民众广泛参与的结果,其核心领导力量也具有联合领导特征,如小知识分子、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和农民的联合领导。加入太平军的农民仅是太平天国利益代表的一个阶级,在运动进行中,太平天国领导者曾反映农民诉求,如1853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和1860年该文献的再次刊刻。

总体来讲,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有了一些新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内涵,但其运动形式并没有超越旧

式农民运动,所建立政权的领导阶级联合体,不是先进生产方式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太平天国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显现出一些反传统的倾向,仍是集中反映小农的意识。《资政新篇》则不是太平天国革命实践的产物,与《天朝田亩制度》不可能并行不悖,况且在实践层面上,它们的核心内容根本不曾被实行。洪秀全等天国领袖们无法使农民摆脱封建制度、礼法社会的束缚,也就不能充分动员农民,所以,找不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最终失败。因此,称太平天国“反封建”,在性质定论上尚有可商榷的余地。但太平天国集农民反抗思想之大成,体现了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思想内涵,这一点毋庸置疑。

如前所述,太平天国领袖曾希望与洋人联手对付清政府。后来看到洋人与清政府联手共同对付太平军,才开始反对洋人。所以过高称扬其反侵略思想,或称之为“先锋”,不太合适。王庆成也认为太平天国与外国侵略者的对抗,是因为他们征服疆土的权利与侵略者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不能笼统地说是因保护国家主权而反侵略。^⑤对太平天国反对外来侵略的思想和行动要具体阶段具体分析。“光复全部疆土”的强烈使命感,终究还是引导太平天国在外敌大举入侵的民族危机时代,做出了反侵略业绩。因之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表述,或可以“反压迫与后期反侵略”相代替,似觉合乎实际。

最后,须对指斥太平天国是“兵祸”,洪秀全是“精神病”“色魔”“野心家”“暴君”“邪教主”等全盘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做一回应。洪秀全在1837年不堪屡试不第的刺激,产生异梦幻象是实,原本朴素平常的情节后来被《太平天日》《天兄圣旨》等太平天国官书夸大和神化。我们不能以后来虚构的神话认定洪秀全在起义立国前患有精神疾病。从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宗教宣教、社会改造方略看,以及洪秀全在天京事变中不动声色地除掉多位政敌,在内忧外患的天京城里做了11年多太平天王,洪秀全确是一个心思缜密、处事不惊、手段老道的人。

洪秀全的88位后妃颇为后人诟病。皇家后宫建制既是君主显示皇权无上、皇家尊严气派的一种手段,某种程度上也是笼络群臣,为我所用,建立统一战线的一种驭下之术。洪秀全虽拥有众多后妃,但只有5子3女,且其中3人为起义前所生。从《天父诗》看,洪秀全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洪秀全自视甚高,且有政治抱负,但他发动太平天国,是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驱策下的必然结果。撇开官逼民反和民生、民族等社会根源性问题不谈,单纯从个人角度推究历史事件发生之因,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除太平天国外,当时整个中国一片火海,捻军、天地会、各地少数民族起义四处造反。洪秀全虽然性情暴躁,但从《天朝田亩制度》和后期颁布的《天王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俗称“减赋诏”)看,洪秀全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爱民思想,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前,洪秀全仍然严诏地方将领不可压迫百姓。上帝教也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伴生物,上帝教在当时能够聚拢人心,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走投无路,渴望“太平”光景,渴求改变悲惨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在上帝旗帜下掀起燎原之势。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政治问题、政治标准,甚至“邪教”概念比附历史问题、历史现象,那样就混淆了正义,犯了比附史学和影射史学的错误。至于太平天国是“兵祸”的论调,其实真正造成江南兵祸的是清军、湘淮军和雇佣军。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开辟专章讨论太平军与清军军纪,分时段、地域和部队爬梳相关史料。该书对太平军以“仁义之师”相称,同时以“暴行实录”为题揭露清军恶行,足以为清军罪恶定讞。^⑥

总之,重新审视太平天国的历史贡献和深刻教训,太平天国的历史面向复杂多重但其主流形象是正面的、革命的:太平天国反抗压迫剥削的正义性、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后期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性应是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面相;对于运动进行中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崇奉皇权、迷信宗教、吏治腐败、权力倾轧、军纪松懈、重税苛捐、民变频发等负面现

象,则充分展现了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大规模农民革命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无论如何,太平天国顺应了19世纪中叶国人反对压迫剥削、反对外来侵略的时代主题,勇于承担起这两大历史任务,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书绘的浓墨重彩不容抹杀,其主体的正面形象不能否定。

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6、191-192页;胡绳:《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1月11日,第1版;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5-18页。

②参见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③近年学界关于太平天国评价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参见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崔志海:《晚清革命史和民族主义叙事体系再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崔之清、姜涛、华强、吴善中、顾建娣、刘晨等:《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④《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

⑤严如煜辑:《三省边防备览》卷11《策略》,清道光二年来鹿堂刻本,第43页a,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2《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清道光二十年爱吾庐刻本,第8页a,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⑥[瑞典]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72页。

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15页。

⑧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9册《书信之八》,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8页。

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转战各地时,曾被欢迎他们的农民称作“天兵”。转引自[日]菊池秀明著、马晓娟译:《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⑪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5-86页。

⑫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逸经》1936年第17期,第909页。

⑬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1924年3月9日),《孙中山选集》(下),第734-735页。

⑭孙中山:《军政府宣言》(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选集》(上),第82页。

⑮孙中山:《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1922年1月4日),《孙中山选集》(下),第526页。

⑯参见《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5-16页;《三字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37页。

⑰《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上),第15页。

⑱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6页;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100-103页。

⑲《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第909-910页。

⑳《额尔金勋爵的报告》,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第204页。

㉑《天王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三),第58-60页。

㉒《威妥玛的报道》,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第206页。

㉓《殿左三中队将李鸿昭等致英法统将照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1页。

㉔[英]托马斯·布莱基斯顿著,马剑、孙琳译:《西人中华西南纪行:江行五月》,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㉕《戈登在中国》,王崇武、黎世清辑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160页;《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

编》(十),第173页。

⑳《同天同日享永活诏》,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7页。

㉑《殿前二天将李五天将莫致美国水师提督照会》,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15页。

㉒《英国议会文书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十),第305-310页。

㉓《寄谕江苏巡抚薛焕着会同浙江绅士与英法两国速商借师助剿等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㉔《钟思等人参加苏州太平军的“志愿陈述书”》,王崇武、黎世清辑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辑,第65页。

㉕㉖《忠王李秀成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

续编》(二),第397-398、398页。

㉗《切忌私藏财物、压迫人民诏》,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㉘《奕訢桂良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4-2680页。

㉙《干王洪仁玕自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二),第412页。

㉚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册,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绪言第49页。

㉛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观念》,《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㉜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277-1566页。

The Natu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ical Evaluation

Liu Chen

Abstract: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was a great example of peasant rebell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millions of Taiping soldiers to join the uprising movement was deeply just. However, as an old-style peasant movement, the "Heavenly Kingdom" they created was still mainly based on the old system of the feudal dynasty, and Hong Xiuquan and other leader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could not find a new way out of the fate of the peasant wars, and eventually failed under the attack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Western invaders. The formation of the anti-invasion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was tortuous and painful. It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or modern China to resist foreign humiliation and fight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refore, the natur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is more realistically expressed as "anti-oppression and later anti-inva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respond to the arguments that deny, blacken and vilify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its leader Hong Xiuquan. In any case,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peasant war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odern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ch echoe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gains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foreign invasio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and its revolutionary and progressive nature cannot be denied.

Key word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nature of the movement; peasant war